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

第六十四本，第一分

出版日期：民國八十二年三月

文化與社會崩解的比較

許 倬 雲

文化是社會群體活動的表現，社會的構成愈複雜，其不穩定性也相對增加，解組也隨之發生。也就是說，大型群體掌握和分配資源，發展了文化體系，但一旦體系臃腫僵化，不足以處理其複雜社會的各種功能時，這一文化體系也就必然分解為複雜程度稍低的次級單元，原有複雜社會所締造的文化也隨之而變質：一方面其內容可能轉為貧乏；另一方面，這些次級單元可能在競爭的過程中，重新分配掌握的資源，尋到新的突破，從而締造新的文化價值及其相應的符號與規範，以此適應新的條件。故此，所謂文化的崩解與漸滅，其實就是社會的改組，改組的幅度越大，其原有文化的延續程度也就越小，這過程可用來解釋歷史發展的規律。

文化與社會在定義上經常混淆不清，本文對於社會的界定是一個時段內，一個地域內，人群聚合為一個群體，而在群體之中，個別成員認同為其一份子，休戚相關，利害相共。文化則是這一社會集體的發展了一套人際的關係，由此而確定公認的行為規範，及對於這些規範的解釋。這一社會也集體的發展了一套符號，包括傳遞信息與意願的語言文字，解釋人與超越界及自然界關係的宗教信仰，發抒情感及感覺的媒介，即是藝術與音樂；生產與交換生活資源的方法，即是經濟與工技。因此，文化是社會群體活動的表現，而其確立的規範與生活方式，又經由世代的傳遞（教育）塑造了下一代的成員，使這一套規範與生活方式，一代又一代的繼承，每一代在上一代的基礎上增減其內容，修改其形式，但大致是延續的，每一代不必從頭開始，重複已經經歷的過程，締造整套的社會與文化。因此，人類社會與文化可以持久發展，繼長增高。

然而人類歷史上也曾有過不少文化不再延續發展，其中停止發展的階段，也

就是歷史上文化的崩解與漸滅。但是，人類子孫繁殖，任何人群在生物學的意義上，未必真正滅絕，只是他們改變了生活的方式，改變了群體的認同，在另一個時空環境下，改組為另一社會，而不再延續其原來繼承的整套規範與符號。於是，所謂文化的崩解與漸滅，其實是社會的改組，改組的幅度越大，其原有文化的延續程度也就越小。

社會的組成有不同的複雜度。一小群人，或以其親緣紐帶（如家庭），或以其功能合作（如獵群，採集群）結合為一個社群。結合的目的單純，持續的時間短暫，也因此掌握的資源有限，資源的累積也不大，也就不能締造可觀的文化。這種單純的社群，我們稱之為「原群」。有些社群經過合併，與增殖，逐步擴大，擴大到相當程度，因為人數眾多，掌握的資源豐富，取精用宏，活動的能力增加，於是可以有內部的分工合作。功能分化既增加了處理特定工作的能力，也增加了社群內部的彼此依賴。這種社群是一複雜的社群，可稱之為「複群」。高度複雜的社會，不僅有功能的分工，而且社會內部又可包含若干次級的單位，其中有的可能原是獨立的社會，而在聚合的過程中，併入更大更複雜的社會，成為其互為依賴的單位。在此高度複雜的社會，內部不免有衝突與緊張，對外也可能經由擴張以擷取資源，因應這些情勢，遂有強制性的公權力出現，以為協調功能及分配資源的中心。這種公權力，即是國家。

高度複雜社會，掌握不少生活資源，也在生產與分配資源的過程中，發揮其解決各種困難的能力。於是複雜社會的複雜性，在於內部有不同性質的構成單元，單元之間及單元之內，也有不同的層級結構，以管理與動員其社會成員及資源。權力分佈的不平等與相應的資源分配不均勻。複雜社會往往由於上述的不平等與不均，而有內部的緊張與異質化。因此，複雜社會也因其複雜性的增加，而有高度的不穩定性，不能像單純社會內部的親密關係。複雜社會的不穩定，解組就隨之而生。如果複雜社會分裂為複雜程度稍低的次級社會，原有複雜社會所締造的文化，也就隨之而變質，一方面其內容可能轉為貧乏，而另一可能的改變則是改弦更張，進行締造一個與新條件相應的新文化。不論哪一種情況出現，原有的文化遂衰落或終止，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文化的崩解或漸滅。

人類歷中上，曾有過不少崩壞的文化，其中有些個案常為後人紀念悲嘆，也有些個案已為人遺忘，只在考古的遺址重現時，始引起我們的注意。對於歷史上文化的盛衰興亡，自古以來屢見不同的解釋。

比較直觀的解釋，是以文化的興盛與衰亡，看作自然的週期。中國古代本有物極必復的理論，而以《易經》為其最典型的代表，盛衰起伏，貞下啓元之觀念深入中國人的思想模式。戰國五德終始之說，影響秦漢政治，相生相勝的解釋，延續到東漢末年。這一套機械的週期論，終究不能構成歷史變化的分析工具。中國的王命之說，以天命與人的行為互相呼應，還是比較合理的解釋，至少將統治階層的行為與能力列為國家興衰的條件，也從而解釋「世運」，連帶說明社會與文化的現況。

在近世理論中，最著名的當是斯賓格勒的興衰週期之說，將文化的發展比擬為人生的生住死滅，由蘊育生命，而青年，而壯盛，而死亡，以為文明都不能避免生機衰竭。他以歐洲歷史的演變過程為例，說明週期的變化。他也以為十九世紀的印度，中國，與伊斯蘭世界，雖然歷世久遠，也不過是枯樹的樹幹，生機早已衰竭。¹

湯恩培的理論脫胎於斯賓格勒，但是在比擬週期之上，增加了「挑戰與反應」的解釋，以為文明是否繼續存在及發展，繫於其對於文明的挑戰，能否有適當的調節。文明的挑戰者是當權者與內外弱勢份子的衝突，而文明在疆域上的擴張，也會導致社會的解體。湯恩培對於文明的茁生與持續成長，視為這一文明精神力量的體現。整體說來，湯恩培的理論體系也與斯賓格勒的理論一樣，是對於歷史現象的敘述，而以不易捉摸的精神力量，當作文化發展的動力。²

斯賓格勒與湯恩培的解釋，其實也是相當直觀的，相反的則是近代考古學對於若干古代文明的實證研究。例如，古代埃及的歷史，曾有過三度起伏；舊王國、中王國、與新王國的衰亡，雖有外患的威脅，卻均與尼羅河的水利失調有密

1 Oswald Spengler, *The Decline of the West* (New York: Modern Library, 1962) pp.73-75。

2 Arnold Toynbee, *A Study of History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2) I、III、IV、V、VI 諸卷。

切的關係。³

中美洲馬雅文化的死亡是中美洲考古學上重要的課題，目前大致已成定論的說法，則是生態環境的改變，以及人口的壓力，導致這一文明的夭折。馬雅文明發達的地區，天然資源相當有限，人口的增多導致游耕農業的過份擴張，以致土壤流失，不能保持生態平衡；生計不足的壓力又導致幾個政治中心的競爭；區間貿易的資源不足，更使競爭惡化，互相殘殺，一度輝煌的馬雅文明遂告死亡。⁴

兩河流域古代文化也是考古學的顯學。兩河古代文化的研究，為時頗久，累積的資料豐富，是以學者對於其文化與社會的興衰，可以提出相當周詳的解釋。兩河沖積平原，城邦林立，逐漸又統一於幾個古代的帝國。兩河的肥沃土壤，較尼羅河流域有更豐富的資源；地理環境也比埃及複雜，不是單純的依靠每年的泛濫沖積。兩河對外交通方便，一方面有區間貿易之利，另一方面則也蒙受境外民族入侵之害。民族來去，朝代更迭，這個地區曾有過世界最早的城市文明，最古老的宗教，甚至在回教興起後，兩河流域也長期是世界幾個主要文明中心之一。然而，即使幾千年來盛衰如環，長程的發展終究是漸漸失去發展的能力。大致在公元第九世紀以後，兩河發展的趨勢是每下愈況。即使最近百年內，因其地理位置及石油資源，一度又有起色，但整個情勢已不能與古代、中古的盛況相比。

自從阿卡特與巴比倫的時代，兩河流域即逐漸發展了繁密的灌溉系統。由於這一片沖積平原上，缺乏林材及礦藏，兩河流域居民只能依仗農業的生產換取其

3 Karl Butzer, *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*.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76) 及其 “Long-term Nile Flood Variation and Political Discontinuities in Pharonic Egypt”, 見於 J. D. Clark and S. A. Brandt (eds), *From Hunter to Farmers: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Food Production in Africa*.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4) pp.102-112。

4 William T. Sanders and David Webster, “Unilinearism, Multilinearism,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.” 見於 Charles Redman 等 (eds), *Social Archaeology: Beyond Subsistence and Dating* (New York: Academic Press, 1978) pp.249-302. Robert Sharer 認為馬雅文化的衰落與印度哈拉本文化的死亡，都與區間貿易衰落，物質不足有關，Robert Sharer, “Did the Maya Collapse? A New World Perspective on the Desmise of the Harappan Civilization”, 見於 Gregory Possehl (ed.), *Harappan Civilization: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* (New Dehli: Oxford IBM Publishing Co., 1982) pp.367-383。

他生活必需品。於是農業生產走向精耕，而區間貿易也是兩河流域經濟體系的重要部份。短期而論，兩河流域可以有高產量的農業，經由貿易以累積資源及財富，人民享受安定而繁榮的生活。但是累年耕種，表土地力用盡，也造成土壤鹽鹼化，農業生產力不免衰退，隨之而不再有繁榮與安定。強有力的國家，爲了充實國力，即一方面擴大水利系統，增加耕地面積，另一方面集中國力，開拓疆土，征服鄰近民族，以掠奪其財富及資源。灌溉系統的龐大與複雜，不再是社區力量所能管理，對外的征伐也不斷增加中央的權力。中央權力的持續增長，終於使禍福成敗繫於中央的效率。一旦中央政權的統治能力不足，整個兩河即使不全盤皆輸，但也土地鹽鹼化，人口減少，貿易衰退，城市荒廢；如有外敵入侵或地方性的叛亂，兩河即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。衰退之後，須俟另一個強大的政權，重建灌溉系統，改進邊際土地的耕種效益，以武力開拓疆土，發展區域貿易，兩河的文化始得又有一次興盛。如此一起一伏，循環不止。兩河的繁榮及文化發展，全繫於政治權力的開展，用盡生態條件下的可能資源。政治權力爲了維持其存在，又必須竭澤而漁，以重稅與苛役，收奪民間的人力物力，民間則只有更進一步用盡地力，以至又有一次崩解。最後，這一片土地上只剩下了微薄的地力。今天的伊拉克，處處可見古代溝渠的遺址及城市村鎮的廢墟，縱然石油的財富及交通樞紐的地理優勢，都已不能再造已衰竭的文明。⁵

本文以上討論諸例，是依照其複雜程度，由地區較小，內容較簡單的開始逐一討論。同時，也由於這些文化的資料大多取自考古發現，文獻不夠，研究的結論遂也不免趨於簡略。中國以外，古代文明中，古羅馬的崩解自然是人類歷史上極爲重要的大事。自古以來，西方史學家頻頻討論古羅馬如何崩壞，此處不可能詳述，至多只是舉幾家主要觀點而已。

吉朋的《羅馬衰亡史》自是經典著作，他所舉導致羅馬衰亡的諸項因素，包

5 Robert McAdams, *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1). 其序文更值得一讀，以欣賞其古今的對比。又 Jhorkild Jacobson and Robert McAdams, "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." *Science* 1958 (128) pp.1251-1258。

括作戰力量低落，羅馬軍團遠征，耽於外地的逸樂，外族佣兵逐漸取代羅馬人，成為軍隊主要成份；他也歸咎羅馬統治階層無能，帝位更迭頻繁，以致領導中心十分不穩定，吉朋甚至以為基督教的興起削弱了羅馬的內部團結。⁶

羅斯托夫扎夫則以為第三世紀以後，羅馬的內部經歷嚴重的社會衝突，以農民為主要成員的軍隊，對於城市貴族的特權十分不滿，軍人出身的皇帝取悅軍隊，導致沉重的財政負擔，同時軍人派系間的鬥爭，也削弱了國防力量，予外族以入侵的機會。因為內亂頻仍，物價高漲，終於人口逃散，城鄉俱蒙其害，羅馬也就垮了。⁷

最近對羅馬衰亡的分析又有從生態方面的考察，羅馬的農業曾有高度發展，以供應盛世的消費；農業過度發展的結果，則是耗盡地力，同時因為擴大耕地，過度砍伐森林，而造成耕地水土流失。盛極之後，土地的生產力跌落，農林人口逃散，竟致耕地拋荒廢耕。⁸

若從疾病對人口的影響言，羅馬軍團東征返國時帶來了東方的疫病，也使地中海地區的人口大為減少。⁹

羅馬帝國從極盛到衰敗歷時四百年，在其開拓的時期，滅馬其頓，取敘利亞，平服高盧地區，以至征服埃及，到奧古斯德稱帝時，羅馬已是地中海的主人，此後則是為了維持這一大帝國，兵車屢駕，征戰不絕，消耗了羅馬人力資源，以致本土空虛，農田必須由外族奴工耕種。龐大的軍隊及行政機構，又使帝國的財務負擔，沉重無比。帝國初期因為征服四方而暴得大利，但是日久之後，羅馬本身終於被這個龐大帝國拖垮。¹⁰

6 Edward Gibbon, *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* (New York: Modern Library, 1776-88)。

7 M. Rostovtzeff, *Th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26) pp.15, 208, 391-465。

8 W. G. van Waateringe. "The Disasterous Effects of the Roman Occupation." 收在 Roel Brandt and Jan Slafstra (eds.), *Roman and Native in Low Countries: Spheres of Internation*. (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, No.184, 1983) pp.147-157。

9 William H. McNeill, *Plagues and Peoples* (Garden City : Doubleday, 1976)。

10 Joseph A. Tainter. *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8) pp.128-66。

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，至少也經歷過兩次嚴重的崩壞，第一次在西周末年，第二次在東漢三國。西周滅亡前夕，有統治階層的嚴重內爭，遂有厲王被放之事，貴族共同執政十四年之久，宣王對外戰爭的失利，有外族的入侵王畿。東方部族入援，而導致王畿人口擁擠，以致畿內財政負擔沉重；有貴族的窮困及與相應的社會變動。最後則經歷嚴重的天災，包括旱災與地震，以及一部份貴族聯合外族攻入首都，幽王被殺，平王東遷。這一連串的變動，內憂外患，天災人禍，接踵交臻。¹¹

西周覆亡，王綱解組，於是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崩解為東周列國，紛擾五百餘年，才完成澈底的改變，由封建化為郡縣。本文開端即提出，複雜社會的不穩定性，其中各個次級單元在複雜社會崩解後，可能分裂而以競爭的方式，重新分配掌握的資源，從而締造新的文化價值及其相應的符號與規範。春秋戰國正是這一嬗變的過程。

中國古代第二次的變局是在東漢，光武中興，秦漢大帝國的原有格局並未有重大的修改；東漢仍是以皇權與文官制度在儒家理念下共治的普世帝國，編戶齊民精耕細作，城鄉之間由市場經濟聯繫全國為大一統的秩序。東漢後半期政風逐漸衰敗，察舉制度漸轉變為大族的壟斷，儒家思想正統化，知識份子貴族化。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強，富者田連阡陌，貧富差別之巨，已形成社會危機。東漢改變西漢的普遍服役制度，維持了相當不小的常備軍。然而東漢的邊防，卻必須依賴附塞的外族（如南匈奴）及邊郡自己建立的雇傭兵（如董卓的涼州兵）。西羌人口不過中國一個大郡，羌亂卻困乏中國，董卓率軍進京，東漢遂亡。東漢也經歷了長期的天氣變寒，西北外族入侵，中國人口南移；大規模的疫癘之災，毋寧也使人口減少；而北方的人口尤其劇減，東漢的北方曾經有過人口增殖，土地不足的時期，政府並曾不時假民公田，但東漢末期，北方村市為墟，盛衰之間可能也與生態條件及地力衰退有關。

東漢的儒家雖為正統之學，但一方面已有王充之置疑於孔孟，另一方面，今

11 許倬雲，《西周史》（台北，聯經出版公司，增訂本，1990）pp.287-315。

古文經學之爭也削弱了正統的學術權威。王弼、郭象之輩援道家入儒學，也正是儒家思想已露了破綻。黨錮之禍，表面上看來知識份子士氣高昂，但也因此實力大虧。更重要的則是佛教入華，已開始在民間生根；天師道及黃巾母寧反映民間思想已有其自己的體系，足以無視於儒家的正統，而組織民間的社會。¹² 同時，皇權與正統儒家由分離而對抗，使政治與文化兩股力量互相沖消其統治與控制民間的實力。靈帝賣官以殖私財，則更為千古奇談，反映統治者本身因角色混亂而自己削弱了政權的合法性。

靈帝時改部刺史為州牧，已萌崩解分裂之機；漢分為三國，中國的複雜社會又一次分解為次級單元競爭的局面，中國的古代帝國及以儒家為基礎的古代文化秩序，從此又須經歷五百年的嬗變，始得重整為中古的社會與文化。

將漢末的鉅變與上文羅馬的衰亡相比，幾乎處處若合符節，兩者都經歷制度的衰敗，經濟的危機，正統思想的僵化與民間思想的挑戰。於是外族的入侵，雖在前代不足為患，而在衰敗之際，小禍可以成大患。統治階層本身的腐化，使政權漸失其合法性。再加天災與人口的流失，終於使龐大的帝國為其本身的負擔拉垮。大型群體因掌握資源，分配資源而發展了文化體系。一旦體系臃腫僵化不足以處理其複雜社會的各種功能時，這一文化體系也就必然分解為次級單元；而在各個次級單元競爭的過程中，遂能逐漸在崩解之後，尋到新的突破，從而締造嶄新的文化體系。這一過程，遂是可以解釋的，而不再是直觀的借用生住死滅的現象當作歷史發展的規律。

本文原為在所中的一篇講演稿，謹以本文紀念芮、高二師。

（本文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通過刊登）

12 Cho-yun Hsu, "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nce and Crystalization of the Confucian System" 見於 S. N. Eisenstadt (ed.), *The Origins and Diversities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* (New York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86) pp.306-324. 又 "The Inter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Fall of the Han Dynasty" 見於 George Cawgill and Norman Yoffee (eds.) *The Collaps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*. (Albuquerque: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, 1986) pp.176-195。